



陶湘： 清芬古墨传隽永

□ 张军

武进人陶湘（1871—1940），字兰泉，号涉园，中国近现代藏书大家、刻书家。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，亦官亦商，处事滴水不漏；显隐之间，家风绵延不坠。他30年藏书30万卷，然而却集于自身，又散于自身，是聚也匆匆，散也匆匆。

少年得志，亦官亦商是能人

陶湘出生于慈溪，因生父陶恩泽在浙江慈溪做官，他从小跟着生父在外兜兜转转。祖母过世，他随生父回到常州，在青果巷住了几年。光绪五年，陶湘入嗣伯父陶锡祺，随嗣父来到山东恩县，跟从寄食的族兄陶钧考览六经，探综群纬，剖谬判疑，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学功底。他以大兴县籍身份到大兴县学读书，后来还以“鸿胪寺序班”的身份捐得五品职衔，经过几年辛苦，被“以知府分省补用，并加三品衔”，这个头衔接近现在的副省级干部，可谓少年得志。

光绪二十八年，陶湘已有从官场转向实业的趋势。当年七月，即被盛宣怀、袁世凯委任为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机器厂总办并弹压地方事宜，属于“亦官亦商”。其间，因成绩突出被奏保奖二品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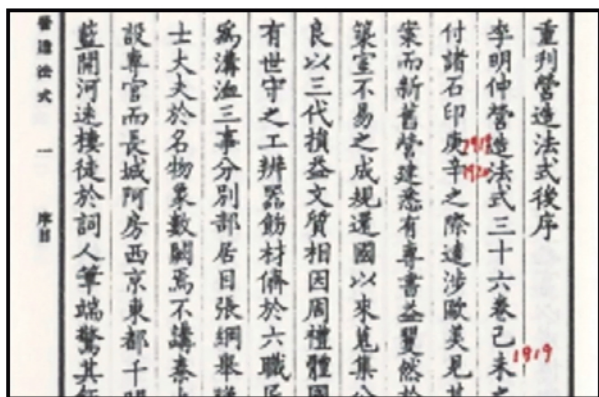
光绪三十二年，邮传部成立，尚书兼商约大臣的盛宣怀器重陶湘，将他调回部里，委任为京汉铁路全路副监督。到了宣统元年，陶湘40岁时，诰封为资政大夫。鉴于外强入侵，国事日衰，朝廷腐败，民不聊生，陶湘萌生退出官场之意，后经盛宣怀委任为上海三新纱厂总办，从

此退出政界。袁世凯复辟时，希望陶湘出山相助，虽然袁对陶有多次举荐之谊，但陶湘思虑再三，婉辞不就。

辛亥革命后，实业、金融界逐渐为世所重，陶湘以“精覈廉能”先后被公推为招商轮船局及汉冶萍煤矿等处董事，被财政部聘任上海中国银行监理官，又获公举山东峰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、天津裕元纱厂经理、天津中国银行、北京交通银行总行代总经理等职。

几代为官的家庭背景，丰富的人生经历，以及不菲的经济收入，为陶湘日后藏书刻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藏书刻书，商场俗世之雅人



“陶本”《营造法式》，朱启铃序

陶湘酷嗜“开花纸”殿版书，搜藏多达500余种，甚至超过内府所储的同类书，一时遂有“陶开花”之雅称。他曾自言，“生平于缥緜外，无他嗜”，因而还被称为商场俗世之雅人。

陶湘收书，遇有孤本秘籍，一直是不计成本地收购珍藏。收藏到宋代刊本《百川学海》之后，陶湘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“百川书屋”。到陶湘40岁时，藏书已相当丰富。他将藏书室取名为“涉园”。据傅增湘《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辞》记载，涉园藏书总数多达30万卷，藏书极

富、刻书尤多，闻名遐迩，陶湘已跻身于大藏书家之行列。

陶湘为中国藏书史贡献了三个名词。一是“陶刻”（亦作“陶本”）。陶湘刊刻的图书纸幅阔大疏朗，纸张洁白如玉，用墨犹如点漆，字体清秀悦目，装订整齐端庄，见之则爱不释手，阅之则气爽神清，被藏书史家推誉为“陶刻”。二是“陶装”。傅增湘在《涉园藏书第一编序》中述之曰：“被以磁青之笺，裹以靛布之函，包角用宣州之绫，钉册用双丝之线，务为整齐华

焕，新若未触。有时装订之钱，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，故持书入市，一望而识为陶装者。”三是“陶氏书套”。陶湘对书爱护备至，稍有破损即觅良工修补，还亲自设计了月牙式四合书套，书林誉之为“陶氏书套”。

丰富的藏书为陶湘校勘创造了条件，他校刊的典籍主要有双照楼宋元本词、缪藏明抄本《儒学警悟》、宋咸淳本《百川学海》、“陶本”《营造法式》等10种、元明戏曲6种等。

而精于校勘是保证刻书质量的关键。从1921年至1931年，涉园校勘、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。经他刻印的古籍，不但校订优良，纸墨优美，而且行款装订均为佳妙，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。因此，很多人都委托陶氏代刻图书，如代张宗昌刻印《唐开成石壁十二经》，代潘复刻印许鸿磐遗著《方輿考证》等。

因在藏书刻书方面的成就，1926年，陶湘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、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，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，历时7年。

家风传承，显隐之间做善人



《溧阳陶氏迁常支谱》部分

陶氏家风，代有传承。

陶氏一族以五柳先生陶渊明为典范，延续儒雅仁德、勤奋务实、廉洁自律之风骨，形成了“耕读传家”的家风和“孝善为先、诚信为本、俭言养德、笃行立家”等家规家训。陶湘嗣父陶锡祺因清廉为官，政绩卓著，百姓为之立碑建生祠。陶湘耳濡目染，深受教诲，谨记“一日在官，则一日为民”，他认为“至于为人，居心宜忠厚，万不可自炫聪明转流刻薄”。

陶湘的品格不仅在“隐”，也在“显”。因祖风尚“大节”，在他的日常经营活动中，“一准利用厚生之旨，厘定章则，斟酌盈虚，操觚算算，亿能悉中，而羔羊食退，廉介自持，故所至之处无不纲举目张，成效大著”。在“厚生”这个方面，有一件事可见一斑。1921年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第二次挤兑风潮，陶湘从中从容筹划，经过三个月，风潮归于

稳定，此举挽救了大量家庭，被当时银行界称道不已。

陶湘致力于校勘、整理、刻印古籍，为的是保存“国粹”。北京曾名噪一时的老书店修绠堂，开业时资金短缺，陶湘从资金和货源上给予极大帮助，还把家中数百卷藏书交给修绠堂代卖，又专门请人刻印了宋、元47家诗词交书店出售，帮助修绠堂支撑了局面。

陶湘60岁寿辰时，苏州近代藏书家、校勘学家章钰作诗为贺，诗句“书福与墨缘，从此到毫厘，传人即传己，早得长生诀”，便是对陶湘奋斗终生、使文化典籍得以保存和传播的褒扬。

1939年抗战时，陶湘得知子女要为自己70岁生日祝寿，极力劝止，“余何人，老拙无能，古稀富贵，何足言寿；今何时，烟尘遍地，国难未纾，更何心言寿”。1939年8月23日，上海《申报》刊载了陶湘70寿辰时将亲友之寿礼悉数折资移赠建设上海灾童教养所事宜。

家风传承，修谱为要。陶湘临终前完成了《溧阳陶氏迁常支谱》的最后修订，此为研究我国谱牒之“样本”。另有考订清代殿版内容的文章《清代殿版书始末记》等，都是嘉惠后学之举。

万卷藏刻，聚散之际见为人



《北魏太妃李氏墓志》部分

成拾帙，名曰《涉园收集影印金石图籍字画墨迹丛书拾帙》，并附有目录、图画。

陶湘藏书，海内外知名，大家争相购买。但因刻书之业无后人继承，陶湘生前就有将遗留藏书及书版交国家保存之愿。据陶湘之孙陶宗琮女士介绍，陶湘临终前，珍藏大部分散去，所剩万余册精本图书及若干碑帖仿宋书板等，共12大橱寄存天津交通银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陶湘长子陶祖椿等遵照父亲的遗愿，将剩余的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。随后，又将天津交通银行库存约40箱书版捐献国家，使陶湘毕生所聚集的最后一批珍藏化私为公，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“别具慧眼识典籍，无奈聚散两匆匆”是对陶湘涉园藏书经历的概括。在中国藏书历史长河中，陶湘先生是一颗流星，虽转瞬即逝，藏书亦流散四方乃至海外，但一册册浸润着墨香的珍贵书籍已成为后世难得的精神财富。



武进区委党史工委、区地方志办协办

作者简介：张军，常州地方文化爱好者、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会员。立足民间，注重踏访，偶有小文见于报刊。